



苗培时的戎马生涯

顾梦红*



房山区的文化人都知道，大石河畔的坨里村有一位受到毛泽东主席称赞的文化名人——苗培时。苗老是大众文学的领军人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经担任北京市文化管制委员会调查研究组组长、北京市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后来曾

* 顾梦红：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原高级教师。



经担任工人出版社领导班子成员，《大众日报》和《工人日报》的编辑主任、新大众出版社总编辑。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苗培时是一位历经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他在青年时代曾经与周恩来、毛泽东、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交往甚密，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的传奇经历更是鲜为人知。

早年投身革命，结识周恩来

1918年农历二月十八日，苗培时出生于大石河畔的坨里村，原名苗振坤。他5岁发蒙，在村里读“四书”“五经”，年龄稍大，到县城附近的洪寺村长育学校读书，积淀了深厚国学根底。长育学校的教师水平和教学质量都很高，在河北省赫赫有名。苗培时12岁在长育小学毕业，英语达到初中水平。小学毕业后，虽然年纪轻轻，却心怀天下、志存高远，他渴望读书求学，增长学识才干，腰包里两枚铜板，就敢只身闯荡上海。由于人地两生，求学未果，回到北平时已身无分文。然而苗培时并没有气馁，他突发奇想：写信给天津《益世报》报社。《益世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他的求助信，并加醒目标题《十六岁少年要读书》。很快《大公报》发表新闻通讯《故都访苗记》。苗培时因此得到许多社会赞助，进入中法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班学习。中法大学文学院代院长黎世珩十分欣赏这位才、勇、谋具备的年轻人，推荐他进入中法大学文学分院就读。在这期间，他刻苦读书，思想上要求进步，忧国忧民，担任了中法大学学生会



常委兼交际部部长，兼任北平市学联常委。1933年，苗培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科的一名成员。中央特科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一个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主要活动地域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主要从事地下工作，包括情报搜集、对中共高层人物的政治保卫、开展针对国民政府的渗透活动等重要任务。

1935年，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苗培时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此后他负责组织、联络、推动北平各大学的学运工作，还组织进步学生到长辛店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学习。他创办党团外围组织“草原社”，出版《草原》杂志，在此他发表了他的第一首新体自由诗《我飞》。苗培时的文学之舟便从这里扬帆起航。北平地下党领导认为苗培时年纪轻轻，不易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注意；又有过上海的经历，多次派遣他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送交北方局的文件。有一次苗培时前往上海送文件，收件人写的是“飞飞”，地址是上海东方饭店顶层右手拐弯第二间。出发前，党组织派人把他布鞋的千层底用刀切开，装入文件，然后再原样缝好。他穿着这双鞋，把文件亲手交给了“飞飞”，可不知道这位“飞飞”是谁？他一直在心中询问。

七七事变前夕，平津危急！日本侵华节节进逼。平津爱国学生为挽救民族危亡奔赴南京请愿，在南京成立了平津流亡学生会，苗培时被推举为流亡学生会生活干事。宋庆龄在慰问流



亡学生时特地找到苗培时询问学生生活情况，并留下了联系地点。当日本侵略者进逼南京时，苗培时从南京出发来到湖北汉口。苗培时在汉口日租界中街找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苗培时这才得知，他送密件到上海见到的“飞飞”，就是他仰慕已久的周恩来。此后在周恩来领导下，苗培时一手抓学运，一手抓工运。他担任了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汉口分会会务理事，并兼任了汉口洋车夫工会的理事长。1938年4月，台儿庄会战胜利后，苗培时在党组织的指导下，与同志们一起在汉口组织了青年学生和人力车夫的百万人大游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延安，毛泽东做了他的班主任

1938年7月，保卫武汉的战役即将打响，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周恩来指示苗培时带领汪家宝等7人奔赴延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的安排下，他们到西安陕北公学分校学习，苗培时被编入第32队。李维汉校长推荐苗培时担任学生会常务副主席。不久李维汉调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带苗培时同行。到达延安后，苗培时进入陕北公校总校高级研究班任研究员。令苗培时惊喜的是，这个研究班的班主任就是中共重要领导人毛泽东。陕北公校校址在延安北门外的延河之滨，毛泽东每周从杨家岭徒步而行来研究班讲两次课。陕公公校高级研究班（以下简称陕公）是培养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摇篮，毛泽东特



别重视陕公的教学工作，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要到陕公讲课。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张闻天、王若飞等都来校做过演讲。毛泽东本人讲过“青年运动的方向”“论持久战问题”“抗日游击战争”“国共合作问题”等。毛泽东赞扬陕公同学们有政治远见，是充满革命精神与牺牲精神的革命的先锋队队员。党中央对陕公的学员寄予厚望。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改变了苗培时的人生轨迹。

1938年12月，陕北公学举办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周年的文艺晚会。苗培时自编自演了一段西河大鼓《北平学生勇闯西便门》。演唱中再现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的大学生进城集会，国民党军警紧闭城门，学生们扛起大圆木撞开了西便门的情景。由于苗培时亲身参加过这次战斗，鼓词写得生动感人，表演也是声情并茂，赢得了满堂喝彩。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推荐苗培时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这便是“延安四大鼓”之一“苗大鼓”的由来。其他三鼓是京韵大鼓荣高棠、滑稽大鼓吕班、河南坠子鼓张可。

从此“苗大鼓”的称号声名远播。年仅20岁的苗培时从此走进了文艺人才荟萃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始从事口头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研究工作。在延安期间他多次去毛泽东家做客，向毛泽东请教大众文学的创作、发展与继承等问题。

毛泽东也一再鼓励他著书立说。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苗培时始终遵循毛泽东的教诲，坚持口头文学（大众文学）的研究与创作。到2014年苗老去世前，笔耕60多年，他共出版作品



小说、诗词、戏曲、故事、寓言、散文、报告文学、通讯等达100多种，3000多万字。苗培时在晚年又和数百万煤矿工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被誉为中国煤矿文学的奠基人。

在敌后，以日军俘虏换取机枪、药品

1940年秋，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对日军的大规模进攻——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者为之震惊。1941年至1942年，日本侵略军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大扫荡。苗培时在1942年一次反扫荡斗争中右臂受伤，伤口久久不能愈合，大夫建议赴北平治疗。苗培时请示军区政委宋任穷。宋任穷立即批准，并给苗培时派了一个任务，让他搞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进入北平后，苗培时住在申宾甫先生家。申先生时任北平市商会常务委员兼煤行商会会长，他的侄子申伯纯是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曾受党的派遣任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参谋长。申伯纯和苗培时是深交，还有点亲戚关系，因此苗培时受到申家热情款待和鼎力相助。

申宾甫家有一常客姓王，是伪满政府一个高级官员的内弟。此人颇有爱国心，很想给根据地做点好事，这样就能给他点上100个红点。点红点是根据地对沦陷区日伪人员做争取工作的一种方法，做的好事越多，点的红点越多，可以将功折罪。苗培时对王有了新的了解后，开始试探着询问一些情况。王很直



截了当地说：“有什么事就说。”

冀中南根据地盛产棉花。棉花卖给商贩，1 公斤只得 1 元伪币。而直接卖到日军手里，1 公斤便可得 5 元。于是，苗培时想与日军有关方面打通关系，直接卖棉花换武器。

经王先生牵线，苗培时和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供给部部长清臧少将开始洽谈。清臧的公开身份是华北棉花株式会社有限公司总经理，苗培时的公开身份是成大棉花公司大掌柜，成大棉花公司的总理由申宾甫先生挂名。

苗培时回忆说：洽谈是在清臧的棉花株式会社进行的，地点就是老北平的北池子 1 号。洽谈一开始，清臧就问：“我们要棉花，你能给多少？”苗培时答：“5 千万公斤。”清臧随手摊开一张大地图，是我冀中、冀南棉产分布图。他边看边说：“太少了，至少 1 亿、2 亿公斤。”苗培时回答：“1 亿公斤可以，不过我是办事员，还定不下来，要回公司向总经理汇报。”清臧又说：“你非八路，能弄到那么多棉花，能把那么多棉花运到北平？”紧接着又说，“没关系，你在北平一切放心，商人无祖国，我们只谈买卖，你要什么军火都可以。”苗培时说：“我知道你们要棉花是制作炸药的，我要轻机枪，要 300 挺。”清臧说：“可以，但军部不可以给你，要到济南去办，由济南的大东洋棉花公司、钟纺公司办理。”

几天后，苗培时偕翻译一行乘火车到达济南。钟纺公司派出 10 多辆小车迎接。到达驻地，受到规格很高的待遇，而且总经理和分公司经理始终陪同。苗培时等候军火供前线，心急



如焚，于是婉言提出：“我们是来做棉花生意的，希望尽早安排谈判。”总经理十分谦恭地说：“生意好说，生意好说。”接着又以恳切的口吻说，“务请诸位耐心住一两天，我们还有要事拜托。”

原来，日本天皇的姑表兄弟在鲁西北根据地失踪了，有可能被八路军俘虏，希望苗培时帮助查找，并声明这件事办成了，要重重酬谢，送轻机枪数十挺。苗培时回答：“事情一定尽力去办。但轻机枪不能要，那样不就成了做生意了吗？”

苗培时回到冀中南根据地，向宋任穷汇报。正巧，宋任穷已了解到鲁西北分区抓获了几个日本人，自称为日本商人，本来也是准备要送走的。于是军区当即电令鲁西北军分区速送这几个俘虏到司令部。

日本皇亲到达司令部，担心要被杀头，哭鼻抹泪。司令部特请日本反战同盟会的同志给他讲清政策，保证一定送他回去，此外还给他和他的随行人员送了换洗衣服，并安排他们到医院检查身体。直到送他们走时，他们才完全明白了共产党、八路军的俘虏政策，非常感动。苗培时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以日军俘虏换取了八路军所需要的武器、药品，为民族解放事业在无形战线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战地记者，驰骋在华北抗日战场

1940年初，苗培时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派往华北担任“全



民抗战社”华北战地特派记者、新华通讯社特约记者，兼任李公朴先生的秘书。他陪同李公朴走访了晋西北、晋察冀、平西、平北、太行、鲁西南等抗日根据地，用手中的笔鼓舞军民的抗战热情，讴歌黄河之滨、太行山麓的英雄儿女。他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1942年，他在日寇大扫荡中右臂受伤。1943年夏，苗培时到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工作，先后担任《华北文化》副主编、《新大众》半月刊主编、《新大众报》文艺主编，曾经以草田、田禾、任青、曹兰、有光等笔名，写过多篇反映抗日军民反抗侵略、英勇斗争的自由体的短诗、长诗、歌谣等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深仇记》、话剧剧本《祖国青年》《人民英雄颂赞鼓词集》、长篇通讯集《咆哮了的冀南人民》、京剧剧本《李闯王》等，歌颂抗日根据地的英雄与人民。从1940年至1949年，他撰写出《走马太行山》《风雪之夜话五台》《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女秘书孙文淑》《过同蒲路遇大雪》等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但在抗日根据地引起很大反响，连重庆、昆明等不少大后方报纸都相继刊载。这期间，他还创作了各种形式的剧本，主要有话剧《祖国青年》、秧歌剧《庆祝太平舞》、快板剧《小两口谈和平》、三幕话剧《开渠》等。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了他编写的《百名英雄》《歌谣丛集》《赵亨德大闹正太路》等书。让大众文化真正为抗战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

解放战争时期，苗培时任新华社特约战地记者，《新大众》半月刊杂志主编。石家庄解放后，他担任了邢台市文教工作委



员会主任，此间创作出许多自由体的短诗、长诗、报告诗、歌谣和短文、论文等作品。

心系百姓的大众文学奠基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苗培时担任北京市文联党组成员、常务理事等职。他曾经先后担任《新大众报》文艺主编，《大众日报》《工人日报》编辑部主任，新大众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煤矿文学学会主任。出版了《人民英雄颂赞》（鼓词集）、《红树岭》《慈禧外传》等几十部作品。改革开放后，苗培时参与了《农民日报》《中国通俗文艺》等报刊的创办工作和农村读物出版社的创建工作。1999年11月23日，苗培时从事大众文学创作65周年、煤矿文学50周年座谈会暨《苗培时文选》首发式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中国煤矿文联称赞他为“煤矿文学创作的奠基人”、新中国大众文学的奠基人。

苗培时生于大石河畔的坨里村，这里是“大石河”的出山口，也是河套沟与山外政治经济联系的枢纽。1906年京广铁路坨里支线通车之后，坨里成为河套沟煤炭外运的集散地。苗培时对煤矿生活十分熟悉，他非常清楚矿工的生活状态与各种需求。1958年，他响应党的关于作家艺术家挂职下厂矿、农村体验生活的号召，到了煤炭部，从此就与数百万矿工结下了不解之缘。苗培时的文学作品语言通俗，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苗培时创作的煤矿题材作品达600万字，几乎占其总量的三分之一，



是迄今为止中国作家中写煤矿行业发表作品最多的人，被煤矿工人誉为煤矿作家。

在进行大众文学创作的同时，苗培时还非常热心公益事业，离休后仍为此努力。20世纪90年代后，他参加了中国公关协会的工作，他带头捐款为赵树理立碑，以纪念这位杰出的乡土作家。他经常深入到农村、厂矿调查，通过各种努力，扶持贫困地区百姓脱贫致富。

苗老离休后，淡泊名利，关注家乡。20世纪90年代初，房山区成立“游子联谊会”，苗培时以70多岁的高龄，毅然受任第一副会长之职，他以家乡发展建设为己任，不仅献策建言，还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积极为房山的民营企业牵线搭桥，助力家乡经济发展。他自己衣着简朴、生活节俭，却多年资助圣水峪村的5名失学儿童上学。他到处捐资助学、捐款救灾，还资助过从小失去母亲、后又丧父的一对兄弟长大成人。

苗培时一生耿介，淡泊名利，一切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从未谋求半点私利。苗培时在70岁时写的自励诗，不仅是对自己一生志向追求的概括，也凸显出作家的襟怀与风骨：

无端寻梦延水流，眨眼风云白了头。

太行荷戈杀倭寇，中原驰骋血染裘。

国土何惜头颅贵，书生从未觅封侯。

老骥羞说柴骨瘦，昂首长嘶志未酬。